

大家手笔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路径

林毅夫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在于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季下降,至今已持续17个季度,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媒体评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是由内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中国经济崩溃难以避免。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然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并不在于内部结构性因素,而在于外部周期性因素。2010年至2013年,中国GDP增速分别是10.4%、9.3%、7.7%、7.7%。同期,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GDP增速同样在下滑,而且比中国严重得多,比如,印度分别为10.1%、7.0%、5.3%、4.9%,巴西分别为7.5%、2.7%、0.9%、2.2%。不仅新兴市场国家在同一时期是这样,一些高收入国家自2010年以来也出现了增速下滑的情形,比如韩国、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必然存在共同的外部原因,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增速下滑。而且比较来看,中国的情况明显好于其他国家。所以,那种认为2010年以来的增速放缓是由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经济必然崩溃的观点,显然是说不通的。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欧洲、美国、日本都尚未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以恢复经济正常增长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长达10年或更长时间的低增长、高失业、高赤字的新常态,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不容乐观。1979年—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长17%,现在还不到10%。出口增长大幅下滑是中国经济由高增速降为中高增速的重要原因。中国确实需要调整增长模式,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为内需拉动型增长。但是,我不同意中国应从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观点。消费固然重要,但以消费来拉动增长,就意味着每年都必须增加消费,而这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展高附加值产业以及改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等都需要投资。如果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费,刚开始人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储蓄来增加消费,但几年之后储蓄用完了就要举债,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就会爆发危机。所以,仅仅依靠消费拉动增长是无源之水。提高投资效率是必要的,但认为中国应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而改为实行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则是不正确的。

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最大差异之一。在需要进行经济刺激时,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展中国家这种机会则很多。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仍然存在很多经济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一是产业升级。虽然中国很多行业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但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仍有机会进行产业升级,这种升级需要吸收大量投资。二是基础设施。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投资,但过去投资主要用在城市之间的交通上,如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较落后,像地铁、地下管网建设等,仍然需要很多投资。三是发展环保产业。四是城镇化中蕴含的投资机会。

现在,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情况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新加坡及70年代的韩国非常相近。它们在同样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8%—9%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中国经济还有20年保持8%左右增长的潜力。中国政府积累的债务只占GDP的40%,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较低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财政空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储蓄率接近50%,为投资提供了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当然,要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消除腐败等影响经济秩序、社会稳定的问题,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以创新理论研究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陈 勃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大作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为创新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报效祖国的大好机遇。探寻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的关键问题,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创新型企业培育、创新政策完善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是创新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和时代使命。

创新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

创新理论研究具有百年的历史渊源。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到亨利·切萨布鲁夫的“开放式创新”,研究者们试图从不同视角理解创新管理的内在规律以及过程。创新理论研究的地位随着创新战略日益受到各国重视而得到快速提升,目前已成为社会科学前沿之一,是国际管理学界、公共管理学界与经济学界等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创新管理学、创新政策学等理论不断发展和成熟,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乃至工学的重要学术前沿。

近20多年来,国外学者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在吸收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思想基础上,注意到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和经济的影响,开辟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国家创新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为寻求一系列共同社会和经济目标而建立并将创新作为变革和发展关键动力的系统,其主要功能是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协调国家创新活动。弗里曼进一步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用大企业代替了企业家,指出创新的

成败最终取决于国家调整社会经济范式以适应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和可能性的能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冯·希伯尔教授研究了创新的民主化倾向,注意到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系统正在快速发展,前瞻性地提出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以用户为中心的开放创新形态。他试图向我们展示这样一种场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先进技术的大量涌现,用户创新将进一步得到发展,企业不应努力寻求用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品,而应给予用户一定的工具,让他们设计和开发适合自己的产品,从细微的修改到重大的创新都可以由用户自己完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提出的开放式创新为创新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相互补充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它强调多主体的参与以及外部知识资源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提倡与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高校、研究院所、科技中介、风险投资机构等进行合作创新,借助开放的外部力量来加快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效率,最终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启动创新理论研究,形成了技术创新学、自主创新、全面创新管理、协同创新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与方法体系,是目前与国际差距最小甚至有所超越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

我国创新理论研究应关注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时代大

背景,为我国创新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沃土,也为我国社会科学理论实现追赶和跨越提供了极佳的条件与环境。作为一门学科交叉融合的典型前沿学科,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必将对我国管理学科、经济学科等的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在学科建设上,应进一步彰显特色,持续开展创新经济学、管理学和政策学等交叉研究,建立和完善以信息化、知识经济为显著特征的创新范式。基于创新理论学科长期的研究积淀和优势,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整合该领域的一流研究力量,必能产生若干具有国际影响的突破性理论成果与应用成果,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与水平,并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在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方面,创新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三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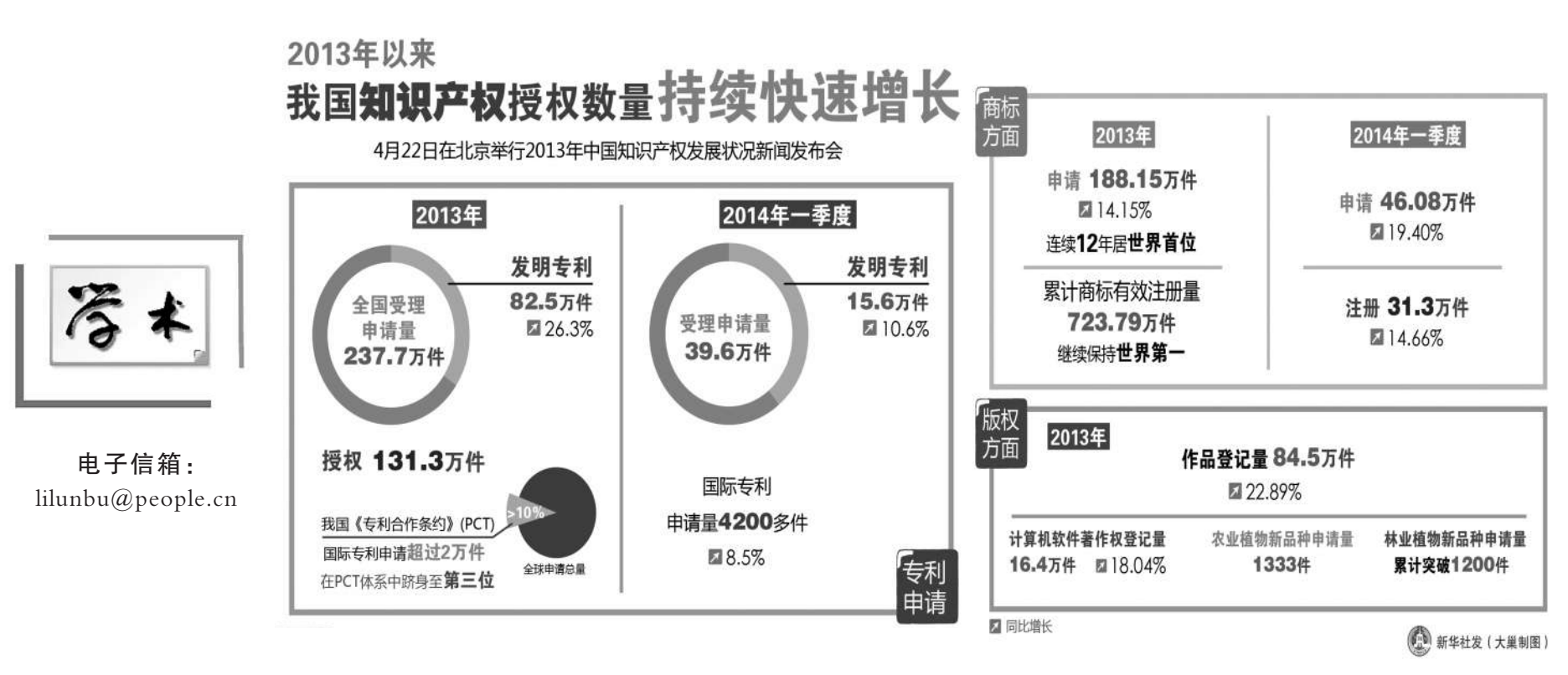
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新动力。应继续关注发达国家在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上的做法和经验,分析其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体制领域的改革及原因,进一步研究我国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现状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 and 结构,分析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的主要制度瓶颈和现实约束,进而设计有利于创新的宏观投资体制、产业组织体制、现代科技管理体制。

如何增强创新战略的引领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和超越,关键是创新战略转型。创新战略应增强主动性、引领性,从政策和战略设计方面更多地强调原始创新,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首先,正确处理自主开发与开放创新的关系。积极顺应开放创新的要求,加快对国际科技成果的引进应用,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制定相应规章制度,推进平台建设,构建以需求导向为特色的技术市场。同时,大力加强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的

投入,有效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与技术吸收能力,提高科研质量。其次,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研究“十三五”时期的战略性重点和阶段性目标,研究需要建立哪些机制、实施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从政府角度研究优化创新驱动制度环境的基本思路和重大举措,包括国家创新体系治理机制设计与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自主创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内涵和关联性,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

如何健全国家创新体系。应注重从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优化公共创新资源配置、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模式、优化新兴产业发展市场环境、完善创新导向的产业投融资政策体系等方面,提出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大幅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在健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重点处理好有组织创新和自组织创新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有组织创新,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的合理运用。在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生态环境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积极部署相关重大基地和重大专项,集中力量开展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化的一体化攻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战略方向定位、国家资源动员、创新人才汇聚、科技成果整合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自组织创新,优化创业政策和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发挥企业家的创造力,鼓励高科技中小企业成长。特别是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创新参与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新中的主人翁作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发出创新研究的中国声音——两场关于创新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本报记者 张怡恬

型经济、创业教育、创新驱动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思想碰撞深化了创新型经济研究。其中,在如何发展创新型经济方面取得以下共识。

政府应积极发挥作用。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把促进创新创业、发展创新型经济作为政府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制定创新的国家战略;维护公平专家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支持初创企业技术研发的政府基金;针对初创企业建立咨询指导中心;等等。与会者强调,一些具有革命意义的技术创新往往是非线性的,源于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或突破。因此,不能仅注重应用开发领域的投入,还应高度重视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大学生创业教育不可或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教授指出,高技术企业的创建者往往是工程师、生物学家、医学博士、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则是潜在的创业者。向大学生传授创业知识,对于促进科技创新和发展创新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认为,创新创业是复杂的多层次活动,既需要科技研发,也需要知识管理。因此,创新创业教学应打破学科限制,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一起学习,促进学科交流。

挖掘大学技术转移的潜力。国外一些大学设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搭建技术转移平台,帮助研究人员评估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获得知识产权保护、参加技术转让谈判等。与会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借鉴与推广。

与会学者强调,创新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有助于各国互利共赢。中国正在从制造型经济走向创新型经济,并有望成为新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几点启示

我国社会科学已初步具备走出去的实力。两场国际研讨会,一个走出国门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一个把世界各地专家请到中国来开,都是社会科学走出去、扩大我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形式。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正在快速提升,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正如联合国大学校长大卫·马龙在“利用创新:培育国家创新竞争力以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言,最近几年,中国学者对世界的学术贡献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从默默无闻到日益活跃,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并且带来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2014科技创业与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国际

3月31日,福建师范大学、联合国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利用创新:培育国家创新竞争力以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发布了福建师范大学编撰的首部英文版《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2)》。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代表和多国国家竞争力研究领域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4月29日,吉林大学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联合主办的“2014科技创业与中国创新型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来自中国、英国、荷兰、俄罗斯、以色列、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孟加拉国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记者参加了这两场关于创新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听到各国学者真知灼见的同时,深切感到我国社会科学学者已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重要参与者,正在为世界繁荣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利用创新:培育国家创新竞争力以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创新研究走出去

这是一场由中国智库主导议题并在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的学术会议。在研讨会上,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世界创新竞争力发展报告(2001—2012)》主编李建平教授介绍了课题组构建的国家创新竞争力指标体系和评价结果。这一指标体系由创新基础竞争力、创新环境竞争力、创新投入竞争力、创新产出竞争力、创新持续竞争力5个要素层指标和37个基础层指标构成。评价结果显示,世界创新竞争力整体处于上升趋势,世界创新竞争力平均水平与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国家创新竞争力世界排名较高的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前20名中只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西方创新竞争力评价多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随机性较强。福建师范大学的研究则基于官方数据,具有更强的权威性,因而获得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美洲发展银行专家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家创新竞争力指标体系经过了三次更新换代。第一代指标主要注重R&D(研究与开发)投资、R&D人才以及技术强度。第二代指标主要从产出的角度强调专利、发明以及技术市场成交数量。第三代指标更加关注创新过程以及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获得数据。鉴于近年来创新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明显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指标体系应进一步完善。

美国国家科学院专家指出,很多衡量创新的模型主要关注创新的回报和智力资本状况,但实际上还应关注创新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国学者提出的指标体系包含创新环境竞争力指标,关注科技创新和自然的关系,很有借鉴意义。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家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全球创新指标报告》,其